

Xian dai xin ru xue de
ma ke si zhu yi guan yan jiu

现代新儒学的 马克思主义观研究

张三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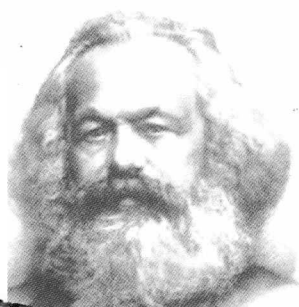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Xian dai xin ru xue de
ma ke si zhu yi guan yan jiu

现代新儒学的 马克思主义观研究

张三萍◎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张三萍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7

ISBN 978 - 7 - 216 - 06886 - 4

I. 现…

II. 张…

III. 新儒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B26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7534 号

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

张三萍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版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字数:174 千字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6886 - 4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6.75
印次: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4.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论文创新点

本文的创新之处首先表现在选题上。尽管已有研究者对现代新儒学的意识形态性及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否定和排斥开展了研究,有的学者甚至对现代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互动关系进行了动态的分析,但是还没有人直接以“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直接以“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为研究对象,期望能引起学界对本文论题的进一步深入探讨。

其次,本文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科学性、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割裂,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的歪曲、否定,通过这种分析进一步说明,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及所使用的手段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并无两样。

第三,本文首次对《批共产主义者的〈实践论〉》、《批共产主义者的〈矛盾论〉》中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首次分析了第三代新儒家林安梧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唯物史观的吸收和借鉴,并指出通过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使林安梧对人的本质、儒学的本质、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的理解不同于其他新儒家而独具特色。

目 录

绪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1
二、研究概况	8
三、研究思路	12
第一章 现代新儒学马克思主义观产生的根源	15
第一节 现代新儒学马克思主义观形成的根本原因	15
一、中国被动卷入现代化潮流的必然性	15
二、中国寻求现代化道路历程	16
三、三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19
四、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态度的形成	29
第二节 现代新儒学马克思主义观产生、变化的直接诱因	31
一、马克思主义从传入到传播的变化,诱发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和批判	31
二、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密切相关	36
第二章 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及历史地位的理解	38
第一节 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的认识	38
一、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非难	38
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性的歪曲	46
三、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否定	50
第二节 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的歪曲和否定	56
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价值	56

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作用·····	58
三、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59
第三章 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 ·····	61
第一节 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关系的认识 ·····	61
一、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生产力落后的中国·····	61
二、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具有特殊社会结构的中国·····	63
第二节 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理解 ···	68
一、现代新儒学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认识·····	69
二、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曲解·····	81
三、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解读·····	83
第三节 现代新儒学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 ·····	85
一、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认识·····	85
二、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错误解读·····	86
第四章 现代新儒学马克思主义观的历程(上) ·····	88
第一节 第一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	89
一、重建道统以阻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89
二、对马克思主义有否定有借鉴·····	95
三、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改变 ·····	108
第二节 第二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118
一、“三统”并建,对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119
二、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系统化 ·····	121
第五章 现代新儒学马克思主义观的历程(下) ·····	133
第一节 第三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	133
一、平等对话的主张 ·····	133
二、“对话论”论域下的对立 ·····	137
三、第三代新儒学的消解和后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借鉴 ·····	141

第二节 大陆新儒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	151
一、大陆新儒学的“儒教复兴”运动·····	151
二、大陆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	155
第六章 现代新儒学马克思主义观的总体评析·····	159
第一节 现代新儒学的合理因素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积极意义·····	159
一、现代新儒学对全盘西化思潮的遏制,客观上有利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59
二、现代新儒学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探索,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61
三、现代新儒学的中国特殊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具有一定的影响·····	164
第二节 “儒学复兴”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65
一、“儒学复兴论”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165
二、“儒学复兴论”泛道德主义的倾向·····	166
三、“儒学复兴论”狭隘的文化心态·····	167
四、“儒学复兴论”实践上不具可行性·····	172
第三节 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之所陷·····	176
一、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不容否定·····	176
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统一·····	181
三、马克思主义历史地位不容否定·····	185
第四节 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之所偏·····	188
一、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88
二、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5
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 相结合的产物·····	199
参考文献·····	205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现代新儒学是产生于 20 世纪中国的一种文化思潮和政治思潮。它一方面与全盘西化的主张对立,一方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对立。经过几个发展的阶段,至今还有很大的影响。要弄清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首先要了解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即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观说到底是对两个根本问题的回答,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本质、特征、功能等多方面问题的理解,并最终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and 科学性、阶级性和革命性、批判性和实践性等问题的看法,它规定和制约着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决定着人们在实践中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现代新儒学具有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观? 它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否正确? 其社会作用如何? 今天研究它有什么意义?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追溯中国现代三大思潮: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学的形成过程。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史华慈在《论保守主义》一文中指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这三项范畴大致同时出现的事实,恰足以证明他们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而这些观念是出现于欧洲历史的某一时期”。^① 史华慈的论断同样适合于中国“五四”时

^① 萧公权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0 年版,第 20 页。

期形成的三大思潮：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具有文化保守主义性质的现代新儒学。三大思潮显示出“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的特点：它们的“共同观念”和由此决定的“同一架构”就是救亡图存，为中国寻求一条现代化道路。然而在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具体选择上，它们是有原则分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武器来观察国家的命运，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结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主张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现代新儒学则主张走“复兴儒学”的道路。这种共同性和差异性并存的特征决定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反对自由主义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学有共同点；在拒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点上，现代新儒学和自由主义又有一致性。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史就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现代新儒学对立互动的历史。

在中国现代鼎足而立的格局中，现代新儒学是同时作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它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西方理论，对它进行歪曲和肢解，其根本目的就是拒斥马克思主义，阻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反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新儒学的显性特征，这一特征在它的开山鼻祖梁漱溟的文化哲学中就得到了鲜明体现。

1921年，梁漱溟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哲学》。在该书中，他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架构中加以讨论，并且断言：只有中国文化所表现的人生态度于现实最合理，可以拯救西方人在功利竞争中的精神烦恼，“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文化比较中，在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上，梁漱溟突出了文化的民族性，这对恢复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反对“全盘西化论”的民族虚无主义未尝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借文化复兴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却与“全盘西化论”异曲同工，他同样认为中国问题必须从思想

文化的层面入手谋求出路,只是他认为这一过程不是对国人思想意识的“完全重建”,而是一种对自身文化观念的调整和对外来文化的适应。在这种唯心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下,梁漱溟对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物质环境与文化创造,只能是有缘,“不能说前者为产生后者之因”;生产力并不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终动因,“还有个使生产力发展可钝可利的东西”^①,而这“使生产力发展可钝可利的东西”就在人类的精神方面。他认为,文化的不同,是由于人类的主观人生态度的不同,不能从物质条件的不同去求文化问题的根本解答。他甚至宣称,“我们政治上第一条不通的路——欧洲近世民主政治之路;我们政治上第二条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的路;我们经济上第一条不通的路——欧洲近世资本主义的路;我们经济上第二条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要走的路。”^②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梁漱溟甚至辞去北大教席,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以抵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梁漱溟开启了现代新儒学反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如果说自由主义是以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以反对马克思主义,那么现代新儒学则期望“复兴儒学”以取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循着梁漱溟所开启的这一方向,用“儒学第三期发展”否定马克思主义,就成为现代新儒学的理论追求。现代新儒学从产生到今天的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

其一,攻击和非难马克思主义,也批判“全盘西化论”的自由主义,并且时常将马克思主义和“全盘西化论”捆绑在一起进行批判。在中国现代的几次最主要的思想论争中,现代新儒学或为主角,或为积极的参与者,不遗余力地攻击和非难马克思主义。在“科玄论战”中,针对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派和玄学派的批判,张君勱攻击唯物史

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6页。

② 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北平京城印书局1932年版,第94页。

观,他说:遵照唯物史观的原则,由于生产力的进化,资本主义之崩坏为不可逃之数,然而“资本主义之成熟,英远在俄之上,顾劳农革命,何不起于英而起于俄乎?以俄与德较,则德资本主义之成熟又在俄上,何以德之革命成绩,反居俄后乎?”^①社会主义何以首先在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这个早被列宁回答了的问题也成为张君劢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张君劢发表《〈唯物辩证法论战〉序》,牟宗三发表《唯物史观与经济结构》、《辩证唯物论的限制》和《逻辑与辩证逻辑》,攻击唯物辩证法,肢解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自然人观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退居港台的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把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发挥到极致。他们大肆攻击、诋毁“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原因就是“五四”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看成绝对对立的两极,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看成是大陆的“沦陷”。由于两岸隔绝的特殊政治环境,也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失误,特别是“文革”的严重错误,港台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极端情绪化。其间,张君劢著《辩证唯物主义驳论》一书,牟宗三也发表《批共产主义者的〈矛盾论〉》和《批共产主义者的〈实践论〉》,将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进一步系统化。

其二,为“儒学第三期发展”进行理论论证。“儒学第三期发展”是现代新儒学设计的中国现代化之路,也是其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正因为如此,现代新儒学的各代表人物都不遗余力地构造精巧的理论体系,为“儒学第三期发展”作形而上的证明。从梁漱溟的“新孔学”、贺麟的“新心学”到冯友兰的“新理学”、熊十力的“新唯

^① 张君劢:《〈人生观之论战〉序》,吕希晨等编:《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辑),吉林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34页。

识论”，再到牟宗三的“道德的理想主义”，无一不是围绕着“儒学第三期发展”而展开的。

综上所述，现代新儒学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一个学派，它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种种误解、曲解、驳难，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否定性价值评价，充分表明了它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一种非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现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严峻的挑战，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回应了这种挑战才取得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新儒学并不是一种过去的历史，它的第三代传人正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国内也兴起了持续的“儒学热”，甚至在中国大陆也有部分学者公开声称自己的新儒学立场，出现了所谓“大陆新儒学”。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估计，现代新儒学送走了“花果飘零”的时代，迎来了“一阳来复”的时机。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分析：从世界范围看，西欧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使人们开始反思现代化运动，要求重估近代西方思想。在这个全面反思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特别抨击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他们认为，正是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流行，片面发展了工具理性，从而使人失去了完整的理性心态，这也就要求重新认识传统，包括东方和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此外，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创造了一种现代化的东亚模式，引起人们对这一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原因的分析和研究。“东亚四小龙”共有的儒家文化背景，促使人们进一步分析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从国内情况看，“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使中国重新步入现代化道路的正轨，这引起人们对有关现代化的一系列问题的关注和讨论，诸如中国究竟应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在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等等。于是20世纪初期的“古今中西”之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演起来，作为“古

今中西”之争中重要的一方,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的流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杜维明、刘述先等第三代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有着前辈所没有的开阔胸怀,提出了和马克思主义平等对话的主张。但是作为一脉相承的学派,平等对话的话语系统并不能抹煞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分歧。杜维明等经常议论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关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他们期望着传统儒学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后能够重新焕发生机,不仅在当代世界多元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与现在世界上各种主要思潮能够平等地进行对话,而且不满足于“词汇”的地位,力图使之成为“文法”,即期盼着儒学能够成为“人类未来所能依赖的唯一定盘针”。这里已经提出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二者谁将指导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和方向?对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如此说来,对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进行梳理、剖析,不仅具有思想史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研究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现代新儒学的理论特质。

如果把现代新儒学放在中国思想界鼎足而立的格局中考查,它的思想特质就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新儒学是作为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它是对“全盘西化论”的一种回应;另一方面,现代新儒学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回应,它拒斥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者都是它的思想特征。

中国大陆学人绝大多数对现代新儒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特征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本着“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①的

①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207~209页。

原则,既注重挖掘现代新儒学中能为我所用的思想资源,也意识到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分歧。但是,从总体上看,我认为他们更侧重于探讨现代新儒学的文化保守主义特征,而对其马克思主义观的系统研究尚有不足。

客观地了解和评价现代新儒学,就要全面地认识它的思想特质。通过研究我们将看到:一方面,现代新儒学反对“全盘西化论”、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努力挖掘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的资源,这些积极作用是不应抹煞的,这也是现代新儒学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存在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在根本的政治问题上,在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现代新儒学所提出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儒家资本主义”等口号,对马克思主义具有分化、削弱作用,对此我们也应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研究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也有利于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受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的非难,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或歪曲或肢解或作简单化庸俗化的解释,其根本目的就是拒斥马克思主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张不尽相同,有的主张复古倒退,极力维护中国封建社会的秩序,如章士钊的“以农立国论”;有的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如胡适的实用主义。但这些思潮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拒斥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将使我们了解到,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非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责难中以自己的真理性赢得人民的信赖、取得自己的主导地位的,从而使我们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和信念。

第三,研究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还有利于我们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

对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分析非马克思主义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的失误和教训,分析其失误的认识

根源和社会根源,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和功能,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坚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指导我们的实践。

二、研究概况

现代新儒学从其产生之时起,就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关注,但将其作为一特定对象来研究,在中国大陆始于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86年,“现代新儒学思想研究”被确定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规划科研项目,更是推动了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在港台,现代新儒学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港台,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历史都不很长,但是成果却很丰富:既有对现代新儒学的总体研究、对各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也有专题研究,包括对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研究。下面我们分别从研究成果、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两个方面说明本论题的研究情况。

(一)研究的成果

1. 对现代新儒学意识形态性的研究

对现代新儒学意识形态性的研究,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大陆学者绝大多数都认为现代新儒学既是一种哲学、文化思潮,也是一种政治思潮,它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这一点最集中地表现在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和批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拒斥上。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先锋方克立先生,他将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概括为三个方面:(1)在哲学观上,以历史唯心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2)在文化观上,以“中体西用”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3)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以“儒学第三期发展”、儒家资本主义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此外,方先生还强调,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对立,也有互动、融合。其后,南开大学的李毅先生以《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

儒学——七十年对立互动的轨迹》为题,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学的对立互动的历史进行了梳理。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现代新儒学是一种“生命的学问”,是一种“内圣之学”、“成德之教”,它并不具有意识形态性。港台新儒学研究者大都持这种观点,如第三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就认为:“儒家思想既不是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也不是一种社会经济的伦理,而主要是宗教性的哲学。”^①这实质上是把哲学、宗教、伦理等内容非意识形态化,借以隐瞒现代新儒学的意识形态性。大陆少数学者站在现代新儒学的立场上,也否认现代新儒学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把现代新儒学看成是抽象的人的学说,认为它是神圣天道和永恒人性的体现,“儒学绝不是意识形态,儒学是天道的体现”^②,儒学是人类生命对神圣天道的体证,是人类精神对形上本体的把握,“它具有永恒的真理性的,永远不会被历史超越”^③。

2. 对现代新儒学的“内圣外王”理论的研究

现代新儒学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儒家资本主义”,概括地说就是“内圣外王”,就是要由传统的“心性之学”开出现代的民主、科学。“内圣外王”是现代新儒学设计的一条现代化之路,也是现代新儒学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对“内圣外王”理论的研究,也可视作对现代新儒学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一个方面。基于“内圣外王”理论并没有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现代新儒学所期盼的功效,对“内圣外王”理论的局限性的研究就成为焦点。研究中存在的分歧表现在: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新儒学的内圣学

① 杜维明:《探究真实的存在——略论熊十力》《当代新儒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51页。

② 蒋庆:《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困境》,台湾《鹅湖》1989年第8、9期。

③ 蒋庆:《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困境》,台湾《鹅湖》1989年第8、9期。

强于外王学,现代新儒学没有避免宋明儒学“内圣强外王弱”的缺陷;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现代新儒学的“外王”的弱,正足以说明“内圣”的不足。

3. 对现代新儒学各代表人物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研究

对现代新儒学的各代表人物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研究,比较集中的是对梁漱溟、贺麟、冯友兰的研究,其中主要是研究1949年前后梁漱溟、贺麟、冯友兰等人马克思主义观的转变。下面分别加以讨论:

(1) 关于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对于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梁的思想在早期和晚期有很大的不同,早期的梁漱溟以意欲决定文化的唯心史观,否定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文化的唯物史观,以乡村建设理论对抗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对晚年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认识,则产生较大的分歧,形成三种观点:其一,认为晚年梁漱溟吸取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以改造自己的理论体系。张岱年、郭齐勇先生认为梁漱溟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能动性的思想,朱伯昆、朱从兵先生则认为晚年梁漱溟吸取了唯物史观;其二,认为晚年梁漱溟具有将马克思主义儒学化的倾向,马海峰、黎业明先生就持这种观点。马海峰、黎业明先生在评价梁漱溟晚期著作之一《中国——理性之国》时指出,梁漱溟在这部书中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品质与传统儒学精神的一致性、相容性,具有颇为明显的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儒学化的倾向。他这样做的目的似乎是想说明,他早年提出的中国文化复兴论,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功,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证实,而且还将继续得到证实”^①;其三,港台、海外学者则认为梁漱溟始终坚持了自己的现代新儒学立场,是“以德抗位”典范。

(2) 关于贺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① 马海峰、黎业明:《梁漱溟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